

吉林省永吉县双河鎮人民公社 双河鎮管理区朝鮮族社会历史調查报告

内部資料
注意保存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吉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編写

說 明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吉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从一九五八年九月至一九六〇年八月底止，先后在吉林和辽宁两省朝鮮族聚居区进行調查。編写出調查报告（初稿）。以后由于該調查組的成員陸續分配了工作，离开調查組，这些調查报告便由延边朝鮮族自治州历史語言研究委员会协助整理出来，交給我們。为了保存資料，我們对这些調查报告仅做了文字上的初步修改，現在把它印出来，提供有关方面参考。

从这些調查报告来看，我們感到，其中經濟基础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的調查資料比較具体、全面；但相对的說，上层建筑方面的材料，如风俗习惯等，却显得比較单薄。有些反面材料，只做了現象的罗列，沒有进行必要的分析批判。另外，有关人民公社部分反映的也比較少，因限于時間及材料关系，我們未做补充。其內容謬誤之处，亦在所难免，謹請同志們指正。

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室
民族研究所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

目 录

一般概况	(1)
一、從朝鮮迁此地到一九三一年以前的情况	
(一九〇九——一九三一年)	(1)
1. 朝鮮族的迁入	(1)
2. 迁入后的經濟生活	(2)
3. 軍閥統治下的政治生活	(4)
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 朝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	(5)
1. “九一八”后朝鮮族人口的移动和迁入	(5)
2. 日寇侵入后朝鮮族人民的悲惨遭遇	(6)
3. 朝鮮族和国内各兄弟民族团结一致, 共同对日斗争	(7)
三、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时期	(7)
1. 民主同盟时期	(7)
2. 国民党統治时期	(8)
3. 解放战争时期	(8)
四、人民政权的建立、发展、巩固和伟大的土改运动	(8)
1. 封建生产关系束縛生产力的发展和朝鮮族人民的貧苦生活	(8)
2. 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反地主、恶霸、汉奸的斗争	(10)
3. 伟大的土改运动	(11)
4. 朝鮮族人民积极参加各項政治运动	(11)
5. 党組織的建立、发展和巩固	(12)
6. 青年团、妇女会的建立、发展和巩固及其社会主义建設中的作用	(12)
五、农业合作化运动	(13)
1. 互助組	(13)
2. 初級社	(14)
3. 高級社	(16)
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人民公社化	(22)
1.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22)
2. 人民公社	(24)
七、文教卫生	(27)
1. 学校教育	(27)
2. 社会教育	(31)

3.文化、艺术、体育活动和卫生事业·····	(31)
八、民族关系和风俗习惯的变化 ·····	(32)
1.民族团结·····	(32)
2.风俗习惯·····	(34)

一 般 概 况

双河鎮位于吉林市的西南。南西邻樺甸、磐石两县，东北靠西阳、大崗子。这里多山多水。山有平頂山、大礮子、青龙山、大奔楼等，均属于长白山脉，山地約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山上尽是幼林，所以說这里是幼林山区。倒木河、磐石河在鎮中会合，故此鎮名为“双河”鎮。此外还有二十一条小河流經其間，水利資源比較丰富。这里的水田就靠此灌溉。在鎮中有一条狭长的小平原，南北七十华里，东西三十华里，面积約为十一万六千六百五十四点零三垧，原是冲积平原，土質大部分是黑鈣土、冲积土、黃沙土等。又有吉沈鉄路、双岔、吉磐公路貫穿其間，交通也較为方便。

这里气候，比永吉县其他地区較为暖和，年平均温度約为摄氏五度至六度。最高温度是三十七度到三十八度，最低温度是零下二十八度到二十九度。此地降雨量为二百厘米。风向多西南，冬季少有西北风。风力最大在春天是五六級，八級极少。春秋平均三四級。冬夏风小。无霜期为一百二十——一百三十天。早霜約在九月七、八日（最晚也只到十二、三日），晚霜約在四月底。

总的說来这里自然条件是良好的，适合于农作物的生长。

双河鎮是一九四七年解放的。一九四八年春建立村政权，双河鎮建立了区政府。那时区很大，現在的鎮只有那时面积的三分之二。一九五六年撤消了村政权，建立了三个乡人民委员会。一九五七年十月十日，由三个乡人民委员会合并成立鎮人民委员会。此时有十一个高級合作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合并成立了一个人民公社（包括一九五八年七、八月間由磐石划进二百三十戶的一个合作社）。目前两乡一鎮（黃榆乡，西阳乡，双河鎮）并成一个人民公社。

永星管理区东靠头道河，南靠鉄道，北靠双河鎮所在地。永星管理区总戶数是五百六十七戶，总人口为二千六百九十人。其中汉族戶为三百零八戶，人口为一千四百四十五人；朝鮮族人口为一千二百四十人；滿族四戶，五口人。朝鮮族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六以上。

一、从朝鮮迁此地到一九三一年以前的情况（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三一年）

1. 朝鮮族的迁入

朝鮮族迁入永吉县双河鎮一带，最早不超过一九〇九年。在这以前朝鮮族有些已經从朝鮮迁入到鴨綠江边的通化、寬甸一带；不过当时人数极少，而且大都是打猎和采药的。这种人在磐石、永吉县双河鎮一带可能沒有。

一九一〇年，日本帝国主义并吞朝鮮后，一部分李朝的旧官吏看不慣日本帝国主义的横行，怀着一定的爱国情緒，他們离开了呻吟在日本帝国主义鉄蹄之下的祖国到中国来，組織独立运动。在“日韓合并”时，朝鮮人民曾經組織过义兵，进行抵抗。日本侵

入后，这些人无法繼續在朝鮮，有的就到中国来了。一九一九年，朝鮮人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掀起了一个規模很大的、群众性的反帝运动——“三一运动”。当时参加运动的有广大的工农群众。在运动失败后，日本的宪兵队就大肆镇压，凡是参加运动的人往往被处死刑，連参加运动人的家屬也要受到同样的迫害。因此，許多朝鮮人作为政治逃亡者到了中国。

当时迁入最多的，还是忍受不了剝削的朝鮮农民。李朝末期，封建压迫已經很惨重。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朝鮮后，为了巩固其統治也勾結这些地主阶级，所以这种封建剝削也是有增无减。如：李建雨家在朝鮮时，自己只有三亩多地，不够維持生活，还要外租十多亩地种。地租是对半分，有时还要多，地主亲自到打場上去看，要多少就得給多少。有时地种不好就要被赶出去。成大永家，在朝鮮租地种，因为朝鮮山多，人多地少，所以有时需要背土开地。尽管是这样种地，地租还是很高。他租的地每亩要八斗粮（当时一亩只能打一石二斗粮），也就是把收入的三分之二繳給地主。不但如此，当时这些租粮还要佃戶給送。当时一部分人不堪这种剝削，就到中国来另謀生活。一九二〇年，朝鮮又遭大旱，沒有收成，因此一九二一年春餓死的人很多。姜东元說：“一九二一年，我正十一岁，遇到大飢，于是全家就过鴨綠江来到中国。当时到中国来的，一帮一帮的，餓死在路上的也不少。”我国东北一带土地肥沃，非常富庶，当时交通不发达，外运不出，粮食很賤。許多地主的粮食吃不完，又卖不掉，常常在仓库里烂掉。当朝鮮族一到中国，不少地主就把这些霉烂的粮食借給难民。当然借給他們并不是由于大发慈悲，而是有着他們的目的。地主們千方百計地想拉到一批劳动力。当时东北一带，地广人稀，缺少劳力。所以这些朝鮮族灾民自然就成了地主的廉价劳动力的来源。

我国富饒的东北对于灾难深重的朝鮮难民來說，是个好地方。所以当时有大量的朝鮮灾民迁来我国东北。

当时迁入我国的朝鮮族人民，多是从朝鮮庆尙南、北道一带来的。他們过鴨綠江，經安东、沈阳北上，或經輯安、柳河、通化再到磐石到此地的。也有的在黑龙江住过一段，再到此地。

当时移民既有一帮一帮的移入，也有一家一家的迁入。另外还有一个一个的移入的，因为这些人贫困到連盘費都借不起，只能一个先来赚了錢讓第二个来，二人赚了錢再讓其他人来。

迁入中国的朝鮮族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即政治、經濟两方面。政治方面是受不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地主的残酷統治和压迫，經濟方面是受不了日寇掠夺和封建剝削下的痛苦生活以及灾荒所造成的死亡威胁。

2. 迁入后的經濟生活

朝鮮族迁入中国后，举目无亲，語言不通，便乞求于地主，租点地种，借点粮吃。可是地主并不給这些人熟地种，只給他們一些草甸子，砍去柳条的踏头甸子去开荒。

朝鮮农民迁入我国时，身上只背一个柳条包，除了一把小鋤和一把鐮刀外，再沒有其他任何工具。他們在向地主租来的荒甸子上开荒。有的人在耕种前先将地翻一翻，有的根本就不翻地。耕种时，首先是放进水，播上稻种子，然后削去野草，再放进許多水。

这样稻秧就能生长出来，但草却长不出来。刨下来的草在地里腐烂变成肥料。当时都是撒种，不是插秧。虽然工具如此简单，耕作如此粗放，但是由于土地肥沃，每垧地产十六、七石稻子，好地能产二十多石稻子。

朝鲜族所开垦的荒甸子是属于地主所有，都要向地主纳租，当时一般每垧纳五石粮。一旦变成熟地后，如果再要租就需要押契。这是因为地主怕佃户不好好种地，荒废了，租子交不上时可以从扣租子。熟地租子是三七、四六为最普遍，也有对半分的。

假如地没有侍弄好，或者不称地主心时，就要被撵走。假如地主想多吃租子，就要花招，不是说地自己要种，就是说亲戚要种，要收回地。佃户如要求再种时就得加租子。这种现象在一九二一年以后逐年增加，因为朝鲜族种水田收入多，汉族地主见钱眼红就要加租。同时由于朝鲜族移民人数愈来愈多，要求佃租土地的人也愈来愈多。原来人力缺少的现象有了某些转变。所以地主便要涨租。当时朝鲜族是流动户，当这一地方租子涨时，或者被撵时就要寻找另一个地方去租地种。朝鲜族的流动是以水田、水甸子为目的而转移。

由于朝鲜族一般的流动性大，所以不得不把粮食卖掉。每当卖粮食时得由地主的车推脚，车脚由他们说了算，卖完后他们说要请客，就得请他们吃喝。卖粮食还得上税，税率是百分之二十。验税的人，制造借口说什么“老高丽有钱”指四斗为六斗来敲詐朝鲜族人民，秋天卖粮时往往粮贱，到了来年春天粮价又涨，从这之中也有损失。诸如此类的剥削举不胜举。

一垧地所打的粮食，经过与地主四二分租，卖粮时交税以及一切花费，剩下已不及三分之一了。所以当时是不够维持生活的。不够时就要向地主借高利贷。

那时的高利贷总是小份子放钱。有年利、月利、五分利、大加一，极少有三分利的。年利一年按十个月计算，如果是五分利，年初借一千吊官贴（军阀专制的吉林官贴），到年末就要还一千五百吊。如果是月利，一年就要按十二个月计算，到年末就要还一千六百吊。大加一利当时也很多，如果年初借一千吊官贴，年末就要还两千吊。此外还有一种剥削最重的高利贷是“驴打滚”，这差不多都是月利。比如最初是五分利，到月就要钱。这时往往是春荒夏锄之时，正是缺钱少粮的季节，那能有钱还呢？可是地主此时就装腔作势地说：家里需要的急啦，或者需要买什么东西啦，等等。其目的就是要涨利。假如利钱经过商量提高到六分，自此，前本加后利一起作本。这些利滚利，往往春天借一千吊，到了冬季还二千多吊。还有一种“拾粮”的形式。“拾粮”是青黄不接时向地主借点粮，还时地主往往任意作价。

此外也有些朝鲜族农民给地主扛“劳筋”。特别是小孩给地主放牛放猪的很多，这样除了自己混个吃的外，搞点钱来还饥荒欠的债。

总之，朝鲜族劳动人民在开垦富饶祖国的东北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用勤劳的双手，简单的工具，使许多荒原、草甸变成了谷仓，把种植水稻的方法传到东北。但是在旧社会里，他们在军阀的统治下所得的只能是受尽压迫和剥削，寄人篱下，受苦受贫，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

3. 軍閥統治下的政治生活

在軍閥統治時期，朝鮮族不但經濟上極度貧困，在政治上也毫無地位。

這一帶的朝鮮族遷入我國後到了柳河、通化一帶時就被強迫入國籍，不過入籍以後仍然受到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的遭遇。朝鮮族成大永說出了朝鮮族的當時境況。

當時的軍閥馬隊，一看到“高麗”屋子（因為朝鮮族住的房子前都掛着辣椒、堆着稻草，很容易看出），就在門口叫，“‘老高麗’出來，蹣馬去！”若是說一聲不字，就拿打腳踢，當蹣馬去後，這些軍隊就進屋去翻，見到小雞就殺，見到好的就拿。當時朝鮮族自己舍不得吃大米都吃雜糧，可是每家都留一、二升大米給老人吃，如果他們見到，也拿去。見到豆油就提去了。

那時如果到地主山上去打柴，動了他們墳地上的干枝，被他們發覺，就要把我們抓到會上（保衛團）去。我有一次被抓去了，會上和官家一樣，我被審了，並且挨了揍，最後還得罰兩袋白面，殺一口豬，打酒請客才算了事。

那時胡子（土匪）也常常騷擾我們，當時我們沒有錢，沒有木料蓋牲口棚，所以養活一些牛、馬，往往就被他們索去了，可是誰能給我們做主呢。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對待朝鮮族。成大永說：“假如每一個人都如此，那我們也不會活到現在。”他又說：“那時漢族勞動人民也有受壓迫的，不過他們是本地人，親故多一些，少許好一點。”“那時鄰居間相互拉扯（互相幫助之意）是有的，而且不斷。”由此看來，各族勞動人民同樣是受壓迫的，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都是友好的。當然在勞動人民中也有人受地主影響的，在民族關係上存在一些隔閡和歧視，不過總的說來他們只是極少數。最值得注意的是許多朝鮮族地主在中國並不受這些壓迫，相反的，他們和漢族剝削階級一個鼻孔出氣。

同時朝鮮族人民和我國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樣，還要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欺凌。

日本帝國主義在侵吞朝鮮以後，於一九二〇年以朝鮮族人民反日為口實在延邊一帶進行“庚申討伐”，在吉林一帶的日本領事館收買了大批特務對朝鮮族青年進行迫害，當時特務如果抓到一個不是莊稼人的朝鮮族青年，就可以到日本領事館領到四十至五十元的賞金。如朝鮮族李建雨從柳河回雙河鎮，途經海龍住店時，被一個特務誣說他不是莊稼人，準備把他抓起來，他在第二天天不亮時就逃跑了，但後來被特務抓回去，綁起來毒打了一頓，最後証實了他確是莊稼人才給放出來了。

朝鮮族人民不甘忍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迫害，紛紛起來反抗。反抗當時這些反日運動都是由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領導的。當時在北滿有吳懋領導的新民府，南滿有參議府，吉林一帶有金東三領導的正義府，在雙河鎮這一帶活動的代表人物則為梁瑞鳳、李貫一等。這一帶的朝鮮族人民稱當時這些政治活動組織為“假政府”。

這些政治組織都有武裝，他們不斷擴大武裝，並且採取募捐的形式集中財力、物力，有錢的多拿，無錢的少拿，平均每戶一年要納三元多錢，不願繳納的就派武裝隊去搶。這些活動都不是公開的，表面上利用宗教團體、教育機關或醫院等為掩護進行秘密活動。但是這些政治組織是分裂的，相互間不斷鬥爭、排擠、甚至仇殺。

一九二一年後朝鮮族中的知識青年（特別是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學生）受到了十

月革命的影响，政治觉悟逐步提高，开始了馬克思主义青年运动。一九二三年初进行宣传馬列主义，七月在吉林成立了“在滿青春青年会”。领导人尹平、朴小兴、李常、崔华和南山录等。一九三〇年中共派李貫国、金世力到磐石去领导他們进行活动。

“在滿青春青年会”从成立那天起，他的任务不但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軍閥統治，而且还要肃清假政府在群众中的不良影响。一九二八年，“在滿青春青年会”和“假政府”发生了武装冲突，“在滿青春青年会”以申世浩为总指揮，由四百人組成六个中队，每个中队六十人，包围了“假政府”。当时青年会沒有枪，以木棒为武器。“假政府”虽然有枪，但不敢放，因为他們是秘密組織，如果放枪就会被軍閥发现。青年会的人把“假政府”的人围困在一个大院子里，最后用木头靠牆搭起来才攻进去。当时“假政府”的人正在院子內杀猪喝酒，毫无准备，結果全部被俘，都給綁起来了。后来除了为首的几名以外，其余的都被释放了。青年会劝导这些人不要再跟“假政府”走。在这次斗争中青年会繳获了十支枪，而且声明大振，人数扩大到二、三千人。

一九三〇年“在滿青春青年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有名的“八一吉敦暴动”。当时参加的人有二百多名，絕大部分是朝鮮族，仅有几名由关內来的汉族（有毕、王等姓）。主要的目标是炸蛟河的铁路桥，攻打老中华民国的兵营，当时除使用手榴弹外沒有其他武器。一开始向兵营里面扔了几个手榴弹，軍閥軍隊即声言要投降，当时外面的朝鮮族用朝鮮話說話，他們听到了，知道这些是朝鮮人，沒有什么强大武器，于是开始拒降。經過激烈的战斗，最后“在滿青春青年会”失败了。

失败后，敌人就大肆逮捕朝鮮族青年人，仅永吉县就押了三百八十名朝鮮族青年。当时有的青年会会员叛变投降了敌人，变成敌人的特务，其中有“在滿青春青年会”的领导人尹平。

这次暴动主要是在李立三路綫的影响下的一种盲动主义，举行这种沒有群众基础的暴动使革命力量大遭破坏。当然这次暴动震撼了敌人，在鼓舞人民这一点上起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許多革命青年忠于革命不怕牺牲的行动更是感动人。可見朝鮮族青年为了祖国的解放，为了革命事业，以热血头颅来迎接有如潮水澎湃汹涌而来的革命潮流，做出了很大贡献。

此外在这一带活动的还有农民会。李学峰老大爷說，他四十岁（一九二七年）那一年来了一些人，领导他們进行示威，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成大永老大爷說：一九二六年从龙井朝鮮族中学来了二十多个小伙子，在突河沟一带扎了根，领导他們打败了正义府，反对軍閥統治。

那时也有許多共产党员在此地活动，领导人民斗争。其中有朝鮮族，也有汉族，比如現在永吉县人民法院院长张仁德同志曾經在这一带活动过。

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朝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

1. “九一八”后朝鮮族人口的移动和迁入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民族存亡，千鈞一发。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各族人民

組織起来，对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直到最后胜利。此外，当时还有一些国民党军队和胡子等也组成了救国军反抗日寇的侵略。但是这些救国军没有正确的领导，其中小部分到处烧杀掠夺，陷害人民，特别是残害朝鲜族人民，挑拨朝、汉民族关系。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有意破坏和这些武装组织的造谣挑拨，使朝、汉两族人民间的民族关系曾一度出现过紧张状态。李学峰回忆当时的情况：“以前朝、汉族人民关系好，但日本鬼子来了以后，关系就变坏了。”据说在日寇侵占东北以后，在这一带活动的武装队伍的首领叫“殿成”，他手下有十几万人，他们为非作歹，遇到朝鲜族就杀害，不是用枪打死就是用棍子打死。在双阳有一次曾经打死了七十多名朝鲜族人民。由于这些匪徒的暴行，使得许多朝鲜族人民无法在这里继续生活，纷纷逃跑。他们白天不敢跑，藏起来，晚上偷偷的跑，他们大多跑到长春和吉林，有的跑回朝鲜去。

当时汉族劳动人民的遭遇虽然比朝鲜族人民略好一些，但是往往也同样地遭到这些匪徒的抢掠和杀害，牲口被牵走，人被打伤或打死。各族劳动人民的命运是相同的。因此各族劳动人民互相关怀，互相帮助。如有一次朝鲜族金海根被日本帝国主义抓了去，关了几个月，后来有一百八十多名汉族联合写了“保条”才把他保出来。朝、汉各族互相支援和帮助的事例，不胜枚举。

在这些匪徒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以后，原来在这一带的朝鲜族人民又陆续迁回来。同时，这时候有一大批朝鲜族也从朝鲜迁到这一带来居住。因为一方面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这些人在国内无法生活下去，迫使他们不得不离乡背井到外地去谋生，也有的人因为逃避兵役而跑来我国的；另一方面，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实行移民政策，有意将朝鲜人民大批移居我国东北，将从朝鲜到我国的车费降价一半。在双河镇一带的朝鲜族大部分就是在“九一八”以后从朝鲜迁来的。

2. 日寇侵入后朝鲜族人民的悲惨遭遇

日寇蓄意挑拨我国民族关系，故意把朝鲜族说成是“二等国民”，地位似乎高于我国其他各民族。但是事实上，广大朝鲜族劳动人民并没有真正享受到所谓“二等国民”的待遇，他们的遭遇仍然万分悲惨。

在经济上：日寇大量掠夺土地，一九三七年日本移民团“自警村”占了一百五十七垧水田，占双河镇全部水田约三百垧的一半以上。划田时偿还之款连原地价的一半还不到。

日寇在掠夺了的土地上，大量雇佣朝鲜族农民耕种，当时是十二垧水田雇六个劳动力，即每个劳动力耕种两垧土地。黄钟大就是给日寇扛活的，每年扛完活后连吃的都剩不下。

“自警村”控制了水源，他们用够了，才准别人用。如果遇到干旱时，那就别想到一点水。谁敢私自用水他们就要用枪打。

挨日本鬼子打骂那就是家常便饭的事了。在商业上，“大东洋行”控制着这里的贸易。解放前这里的朝鲜族除两户富农外，其余全部是贫农。他们除了做长工外，就是租地种，每垧地四、五石租子。当时朝鲜族所种的水稻完全“出荷”，日寇所给的钱与市价相差一半，每年收成最后剩下的就寥寥无几了。

此外，还交纳户税，出麻袋，“勤劳俸仕”等等。在政治上，日寇实行特务统治。勾结“独立党”的“南化一”鱼肉朝鲜族和我国其他各族人民，当时南化一、金斗一、

金斗千、朴燦俊等在这一带横行霸道。

此外，还实行了归屯。日寇为了防止游击队的活动，归屯有限期，如不按期搬家就放火将村子烧光。一九三六年此地只有十七户，其中有汉族，也有朝鲜族，为了实行归屯，把二十五间房都烧了。东西不准拿，一个小孩也被活活地烧死了。

在文化上，日寇实行奴化教育，严格禁止说朝鲜语。在学校里说朝鲜语被罚五分錢，在公共场所则罚一錢角。买火车票时，要说日语和背诵“皇国臣民誓詞”，否则买不到票。

日寇更恶毒地挑拨我国民族关系，說朝鲜族是“二等国民”，表面上对朝鲜族說：“你和我们一样，租种土地可以少給一些租子”。由于日寇的挑拨离間，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朝鲜族和国内各兄弟民族之間隔閡。有的汉族往往便不愿意把地租給朝鲜族耕种，朝鲜族农民租不到地种，生活更加困苦。

3. 朝鲜族和国内各兄弟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对日斗争

尽管敌人費尽心机，挑拨我国民族关系，但是由于朝鲜族和国内各兄弟民族間的传统友谊，以及在各民族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下，各民族的命运更加紧密联结起来，因此各民族間友爱团结，在这个时期同在其他时期一样，仍然是我国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在生产上，朝、汉各族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朝鲜族教汉族种水田的技术，汉族教朝鲜族种旱田和种植蔬菜。在生活上，互相关怀照顾。朝汉两族人民还有的結拜为兄弟，如李学峰等两名朝鲜族和十名汉族拜“把子”（即結义兄弟），成大永老大爷等三名朝鲜族和四名汉族拜“把子”，他們相处得就像亲兄弟一样。

由于这里有铁道綫，又是平原地带，很少有抗日游击队的活动。这里只有三户参加过游击队，不过现在这些人有的牺牲了，有的搬走了。

但是广大的朝鲜族和各兄弟民族人民是不甘心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榨的，他們用种种方式进行反抗，藏粮食就是当时一种普遍的斗争方式。伪滿时朝鲜族种的水稻按日寇規定要全部出荷，許多朝鲜族人民就把打下的粮食偷偷埋在地里、場园里或坑洞里。成大永在一九四三年就藏了十五麻袋粮食。后来被坏蛋告密，日寇把他抓了去，最后经过請客說合，才被释放出来。

三、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时期

1. 民主同盟时期

“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后許多反动的地主故意造謠說“国軍（指蔣匪）来了第一个就要杀朝鲜族”，造成了一时的混乱，許多朝鲜族又逃回朝鲜去。一九四五年十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口前成立了朝鲜民主同盟，社会秩序才逐渐稳定下来。委員長是林学成，他是地下党员（当时的党支部有林学成、安圣国、尹大根、南变周、张师伯等）。双河鎮民主同盟委員長是許东根，青年同盟委員長是許商喆，妇女同盟委員長是許东久的爱人。这个組織一方面稳定当时混乱的情况，一方面組織成員学习“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等等。

在当时双河鎮一带还組織了青年訓練武装，主要目的是防备土匪，保卫人民财产。

这支武装在一九四五年参加解放军，成立了朝鲜义勇军二中队。双河镇一带当时参军的户数约有一百三十户左右，占当地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五·二八”解放军暂时撤退后，民主同盟也随着撤到通化一带。

2. 国民党统治时期

“五·二八”大撤退后，三个多月这里没有人管。三个月后国民党才来。国民党来后汉族成立了治安维持会，朝鲜族成立了自卫团。这是由伪村公所职员、伪警和地主分子组成的。此外这里还设立了警察局、乡公所、国民党区党部、三青团区党部，还有外国侨民会、朝侨青年团等。

国民党在这里虽然时间不长，但在短短的时间内却实行了恐怖统治，当时有一个陈监督警尉，他在这里专门找八路军的标征，如纽扣帽子等。抓到可疑的人，就灌辣椒水，上各种刑具，两天后押送吉林侦缉队，送去以后就没有活着回来的。当时，对于朝鲜族的迫害特别厉害，不分青红皂白，抓一个算一个。国民党的另一名走狗朴燦俊，依仗国民党势力为非作歹，曾把东山河一名小孩装到麻袋里摔死。富农金炳崔（译音）的小老婆勾搭上伪警察局罗局长，并告诉他解放军军属和干属的情况，结果解放军十二名家属都被抓去，其中有的人刚生下小孩，母亲和婴儿都被投入狱中，受冻挨饿，后来各族群众凑了些钱才把他们保出来。在国民党匪帮这种恐怖统治下，朝、汉各族人民几乎都不敢出门了。

国民党的暴行激起了各族人民的愤恨，广大人民更加清楚地认识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

3. 解放战争时期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李红光支队从通化进到这里东边西边的炮楼，那时炮楼四周有木橛子，解放军战士使用枪把橛子扫掉，几名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勇猛地冲到炮楼下，最后终于迫使敌人投降。四月十四日李红光支队在西山集合后便开往别处攻打六十军去了。后来是山头部队，三〇三支队等在此地打拉锯战。解放军在西山一带，国民党则占据了长岗岭，打了七进七出。最后于九月间解放了双河镇。

在拉锯战期间，生产停顿了。解放后，解放军把俘获品（除了军用物资外）分给了群众，群众大为感动。

双河镇的解放，是朝鲜族、各兄弟民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斗争所取得的胜利，它标志着各族人民走向新生活的开始。

四、人民政权的建立、发展、鞏固和伟大的土改运动

1. 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和朝鲜族人民的贫苦生活

解放前，由于日伪的残酷统治和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这里的农业生产力一直处于低下的水平。

朝鲜族农户都种水稻，使用的生产工具是铁锹、水田洋犁、镰刀和人力打稻机，运输工具是由“朝鲜牛”来曳引的花轮车。但是由于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絕大多数的朝鲜族农民都是贫苦农民，遭受沉重的封建剥削，又不具备必要的生产工具。

因此无力深耕細作。解放前，稻田不上糞，播种的方法一般是撒播，只有极少数插秧。播种后一般是薅一遍，“拿大草”一次，多者是薅二遍。在不受自然灾害的平常年里，平均每小垧收获十石至十二石（每小垧为七千二百平方米，每一石是三百一十二市斤），即每一小垧收获三千一百至三千七百市斤，較差的稻田，每一小垧只能打七石，即二千二百市斤左右。收获的粮食大部分被敌伪和地富掠夺去，农民手里所剩下的粮食不足糊口，所以連維持简单再生产也是相当困难，至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农业生产力就更談不上了。

解放前每垧地租四石，此外还有水田沟渠的租子若干，两项合在一起每垧需要租五石，剝削率是百分之四十二——百分之五十以上。初期交实物地租，后期因为敌伪把水稻全部控制，所以折价交租，租价和“出荷”粮价相等，剝削率沒变（这里包括經營地主的剝削在內）。

有一种地租叫“鉄板地租”，这种地租一面是活的，一面是死的，即如果增产，按增产时的总收获提租，如果减产，則按原来預定的地租提租。

在敌伪統治时期，朝鮮族农民种的水稻，除了留种粒而外，全部“出荷”。出荷給的錢只相当市价的百分之五十。农民辛苦一年自己却吃不到一粒稻米。

地富的剝削和敌伪的掠夺合在一起，占去了农民一年农业收入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在农民手里的只不过是不足一年农业收入百分之二十五的伪币而已。农民用这些伪币再换取从樺皮厂拨来的粗粮，作为全家大小的口粮。粮价和市价一样。实际农民所得到的粗粮也是寥寥无几，因此常年缺粮。

如果种不起地，便只能給地主富农扛活，强的劳动力，一年最多也只能賺十石左右二、三等的稻子。

除了給一般地富扛活而外，有的人也去給当时在这一带的日本人吃“劳金”。小的工具自备，到秋天雇主得收获量的百分之六十，雇工得收获量的百分之四十。如果在缺粮的时候借了雇主的粮食，到秋天时以五分高利偿还，本利还清。日本雇主經常打罵雇工，不把雇工当人看待。

有的人不会日本話，去到日本人那里吃劳金，需經会說日本話的人介紹。介紹人除了得到雇工送的礼物之外，还要从雇工所賺的工資中扣除一部分，实际是扮演了“把头”的角色。

日本移民团对朝鮮族农民的剝削，在整个封建剝削中占有一定的比重。移民团团长“大原”，他从北海道来到这里时是个穷光蛋，由于吸食了中国农民的血汗，临走时变成了富翁。

在封建剝削階級中，有一种是經營地主。他們除了吃封建地租而外，还兼做土地轉卖的經紀人，或从事“抬粮”和放高利貸的封建商业資本活动。

农民在缺粮的时候，就不得不向經營地主“抬粮”。春借一斗秋还二斗。

不抬粮，便得借債。利錢是“大加一”。如果年初借五十元，年終还一百元。如果今年还不起，那么便把今年的高利貸本利合一，作为明年的貸本，利息仍然是“大加一”，到年終又是本利齐。結果明年年終的本利，正好相当于今年年初借貸的四倍。这

叫做“利打滾儿”。被高利貸罗网卷进去的人，是很难掙脫出来的。

敌伪疯狂掠夺和地富残酷剥削的结果，使朝鲜族农民生活陷入非常困苦的境地。农民虽种水稻，但自己却吃不到一粒大米；而且連粗粮也是吃不飽。到冬天的时候，沒有御寒的衣着，穿着单衣过冬，并且还經常受地主及日本雇主的打罵。貧农金永述，在伪滿的时候，經常受經營地主金斗干到家門口的咒罵，并且还常常吃金斗干的“文明棍”。金斗干又私刻金永述父亲的印章，到“金融組合”冒領伪农业貸款，从中霸占伪币二百元，使得金永述全家当年生活更加困苦万分。类似事例，在当时來說，是最普通，最一般的。

“九三”胜利后，国民党匪軍逃窜到这里，这时朝鲜族人民的境遇更是不堪設想。匪軍一見到朝鲜族人便叫“高丽八路”，迫害朝鲜族父老兄弟姊妹，使人們經常在惊恐中过日子。人民衣物财产被洗劫一空，生活逼迫到赤貧如洗的地步，生产也处于停滯不前的状态。

一九四七年六月这里获得解放，从此朝鲜族和各兄弟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生活。

2. 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反地主、恶霸、汉奸的斗争

解放后在这里建立了双河鎮区政府，当时区委书记是蔡元真同志，区长初为田夫，不久就由张世佰繼任。

区政权建立后，双河鎮的朝鲜族和汉族便分別組織了农会。并选出貧雇农积极分子当农会主任。当时朝鲜族农会主任是崔太福，汉族农会主任是董奎，到这里来的工作组和农会紧紧的抓积极分子，进行宣传教育，准备进行“砍挖”斗争和土地改革。前东北局曾派干部来领导工作，永南县县长白东財曾亲自领导这里的“砍挖”斗争。为了形成可靠的骨干力量，充分发动群众，以保証彻底摧毁反动的封建势力及其經濟基础，使广大貧雇农彻底翻身，工作组和政府首先教育和培养黃中大、孔永春、李繼和三名貧雇农积极分子。被团結的积极分子每人再去团結別的可能团結的对象，这样一共团結了二十余名积极分子。在农会中便形成了貧雇农的骨干力量。一些重大問題都是首先經過以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为核心的貧雇农团研究之后，再交农会全体討論。

“砍挖”斗争开始时，首先召开貧雇农群众大会，宣传砍挖斗争和土地改革的方針政策，講解了“砍挖”斗争，打倒地主恶霸，使土地还家的意义，并向广大群众交代了“貧雇农路綫”的政策，即一切权利属于农会，貧雇农說了算。开始动員时，个別人思想上有顾虑，怕共产党呆不长，怕反动統治阶级复辟报复。但經過反复宣传动員，交底之后，特别是由于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广大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整个的斗争形势发展得非常迅速猛烈。

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后，首先对于过去有錢有势或者当过汉奸特务的人展开无情的斗争。該抓的抓，該斗的斗，該枪毙的枪毙，揭开斗争序幕的是公审国民党特务郭××。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占領着长嶺岭，我县大队控制着西山，双河鎮正处于拉鋸战的中間地带。此时郭特务化装卖干豆腐的去西山刺探我軍情报，报告給国民党，使我軍在欢度端午节之际遭到敌人突然襲击，伤亡很大。公审大会有一千多名群众参加，群情激憤，在群众一致要求下将这名罪大恶极的特务枪决了。接着又斗争了民憤很大的大地主兼伪村长李

大巴掌（汉族），国民党特务蘆万道和富农金炳崔的小老婆。蘆万道經常为国民党刺探我軍情报，并在群众中故意顛倒黑白，說国民党好，共产党不好，造謠說共产党不久就会被消灭等等。在群众一致要求下，李大巴掌和蘆万道都被枪决了。斗争金炳崔小老婆的时候，由于群众对她切齿痛恨，結果活活把她打死，当时有的群众說：“打死她可以节省一粒子弹留給前方。”有的說：“她死的太快了，应该讓她多受点折磨。”

在斗争中群众的政治热情如此高涨，斗争运动发展得这样迅速，絕不是偶然的。这主要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这里的群众基础条件好。因为，第一，在一九四六年“五·二八”吉林撤退以前党在这里做过群众工作，通过“民主同盟”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在保卫家乡，保卫生命，拿起武器的口号下，百分之八十的朝鮮族青壮年都参了軍，广大群众已經有了一定的觉悟。第二，“五·二八”以后国民党来到这里。国民党匪軍和“地方公安維持会”“韓國侨民会”等給群众进行了一次反面教育。在遭受血洗和迫害的日子里，群众深深地体会到国民党是中国各族人民真正的敌人。第三，一九四七年四月后，这里是敌我双方“拉鋸”的地带，国民党匪軍和解放軍进出七次。我軍来到这里的有“三〇三”部队、七三部队，“山头队”等，以烈士子弟为主要部分，政治素質高，战斗力强的李紅光部队也来过这里。我軍每次来到这里，都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并把地主随国民党匪軍逃跑时遺留下来的东西分給群众。反之，国民党匪軍一到，則烧杀掠夺，无恶不作，造成一片凄惨景象。因此，群众清楚地認識到：究竟誰是救星、誰是禍手？

广大群众通过这场激烈的斗争，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和鍛炼，提高了阶级觉悟，这就为下一步的土改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3. 伟大的土改运动

一九四八年二月正式进行土改，划分阶级成分，全村（即今永星管理区）五百多户中有地主十四户，富农二十多户，中农七十多户，其余为貧雇农，其中朝鮮族有富农二户，中农八户，貧农一百六十多户。在依靠貧雇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方針指导下，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起来，彻底斗垮了地主，沒收了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征收了富农的土地财产的多余部分，将土地和财产分配給貧苦的农民。翻了身的农民个个喜洋洋，每人分到水田一亩二分，如果分到的是旱田，則加倍，即每人得二亩四分。地分为三等，軍烈屬分到了好而近的地，其次是貧雇农分得了較好的地。当时共沒收了七十多头牛，三十多匹馬，还有五头驴。朝鮮族主要是分到了牛。軍烈屬沒有牛的，每家能分到一头牛，当时沒收来的浮财，装滿了七間房子，根据需要和生活情况进行分配，在分配上述胜利果实时，召开大会通过后执行。

在伟大的土改运动的实践中，人們得出了正确的結論：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光明和幸福。

4. 朝鮮族人民积极参加各項政治运动

解放了的朝鮮族人民热烈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各項政治运动，为了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彻底打垮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各族人民积极参加和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的两次扩軍中，这里就有六十多名（其中朝鮮族四十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一九五〇年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邻邦朝鲜，威胁我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各族人民积极响应抗美援朝的伟大号召，青年们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有的青年就心自己体重过轻，不被录取，便偷偷把砂子带在身上以增加体重。这里共有十七名青年参加了志愿军，有两个弟弟参军的党支部书记高中华（后来在前线光荣牺牲了）带头参加了第一批志愿军。有四十名青年参加了担架队。在这里的朝鲜族中，全家有两三名都参了军是很普遍的现象。

为了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五一年朝鲜族人民又和各族人民一道积极投入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朴燦俊就是在这个运动中被这里的群众揭发和检举的一名反革命分子。他是伪满时期的汉奸和国民党的狗腿子，为虎作倀，杀害人民，为了隐蔽自己的罪行，还企图毒害自己的朋友。在群众一致要求下，这个反革命分子终于被枪决了。通过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使广大群众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和锻炼。

5. 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和巩固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党区委注意教育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月间先后吸收了李祥熙、黄渭芬、崔太福和黄中大等（均为朝鲜族）四名积极分子参加了党，当时党员预备期是三个月，九月转正后，在这里便建立了一个党支部，党员共四名，李祥熙为支部书记，崔太福为组织委员，黄中大为宣传委员。此后，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一九五〇年这里已有党员十二名，其中朝鲜族七名，一九五一年为十九名，其中朝鲜族十二名，到一九五三年党员已发展到二十五名。

在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党又注意加强党的思想工作。一九五二年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整顿了党的组织，通过整党纯洁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加强了党的战斗力，在各个战线上党员都起了应有的模范作用。

6. 青年团、妇女会的建立、发展和巩固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这里的青年团于一九四九年建立，当时只有团员二十名，团支部书记是金熙权，组织委员是黄明永，宣传委员是李明顺，后来团员不断增加，到一九五八年团员发展到一百零七名。共青团自建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组织和教育团员，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各项工作中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许多团员带头报名参军，有的团员在朝鲜战场上立了大功。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团员除带头入社外，还对农民群众广泛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积极推动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在初级社建立初期，南龙益、申相德、崔八奉等农民对入社有顾虑，团员守仁福、孙顺伊等就经常到他们家里耐心地向他们讲解党和政府关于合作化所采取的方针政策以及合作化的优越性等，帮助他们解除顾虑，最后他们都愉快地自愿参加了合作社，在一九五五年，许多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当时有十户农户对入高级社发生犹豫，但经过团员们分为五个小组，分工包干，进行深入动员宣传以后，认清了正确的道路，都自愿地参加了高级社，使入社农户比率达到了百分之百。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间，有的青年学生不安心在农村工作，盲目流入城市。针对这种情况，共青团就在党的领导下，对广大农村青年开展了热爱农村、热爱劳动的宣传教育，教育青年要树立建设美好幸福的农村的雄心大志，成为农村的生产和科学文化事业中的突击力量。

高中毕业生金九星原来不安心在农村工作，在城市另找到了工作，但受到共青团組織的教育和帮助后，認識到农业劳动的光荣，便决心在农村扎根，努力建設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后来他被評为社会主义建設积极分子，曾两次参加吉林省社会主义建設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两次出席县劳模大会。其他农村青年也和金九星一样，逐渐安心于农业生产了。共青团員們在兴修水利、深翻、积肥等等各个战綫上都起着骨干作用，以团員为核心組織的生产突击队，一貫出色地完成党所交給的各项工作任务。农村的扫盲工作和文娱活动也以团組織为核心开展起来，这个管理区在文艺和体育方面創造了出色的成績，因而曾經得到县的奖励。

妇女会是在一九四七年建立起来的，当时会員有一百七十名，会长是申粉南，組織委員是郭英淑，宣传委員是柴××。到一九四八年二月，会員发展到二百八十名，妇女会从建立以来，在各项政治运动和各个生产战綫上都起着积极的作用，如在砍挖斗争，拥軍支前，合作化运动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妇女会都作出了优异的成績。

五、农业合作化运动

1. 互助組

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彻底消灭了封建和半封建剝削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农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闊的道路。但是个体小农經濟有它的局限性，而且是产生資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温床。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适应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和改善农民生活，党及时的提出了“組織起来，发展生产”，有觉悟的农民首先起来热烈响应这个伟大的号召。在一九四八年冬天这里便出現了互助組。最初的互助組由七戶朝鮮族貧农組成，現在管理区的主任——李帆宰同志就是当时互助組組长。該組有水田約十垧、牛二头，一头是牯子，一头是母牛。

一九四九年在朝鮮族农民中，已經有了两个互助組，都是常年互助組。其中李帆宰的那一組，有十戶参加。有土地大約十三垧七亩（水田）；有洼地、有土泡子，也有黃土地，而且較分散。

在最初組織互助組时，有人只願意找力量較强的农戶参加，却不願意要缺乏劳动力、力量較弱的农戶。而这些力量較弱的农戶大部分是軍烈屬。后来經過宣传教育，才逐渐改变了这种情况，每个互助組都吸收一定戶数的軍烈屬参加。

初期，参加互助組的大多数是干部，群众大多数还是单干，个别农民搞些商业活动，通过販卖牛，倒騰买卖等，想发财致富，資本主义自发势力有了发展，但是自从互助組成立以后經過两、三年的发展，实践証明互助組比单干戶优越，互助組可以初步解决劳动力不足和牲畜工具不足的困难，农民在看到互助組的这些优越性之后，便越来越多的参加了互助組。到了一九五二年，这里就已經有四——五个常年互助組了。夏天区里召开劳模大会，会后以李帆宰同志为首的三个互助組长在一起商議准备三个組并成一个組，最后在三个互助組里联合大会上正式作出了決議。当时选出組长、副組长、組織委員、宣传委員、監察委員、評分委員、會計等七名干部（关于干部名額和职位，当时上級沒有給指示，这是他們三个組自己决定的）。当时联組共有二十七戶。这就是后来成